

魏晋诗人的人生意识



邓福舜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魏晋诗人的人生意识

邓福舜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魏晋诗人的人生意识/邓福舜 著. —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3. 5

ISBN 7 - 5317 - 1597 - X

I. 魏... II. 邓... III. 古典诗歌 - 文学研究 - 中国 - 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I 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32121 号

Weijin Shiren De Rensheng Yishi

魏 晋 诗 人 的 人 生 意 识

作 者/邓福舜

责任编辑/梅庆吉

封面设计/耿文南

出版发行/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

网 址/<http://www.bfwy.com>

邮 编/150020

电子信箱/bfwy@bfwy.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黑龙江省阿城制版印刷厂

开 本/850 × 1168 1/32

印 张/9.5

字 数/225 千

版 次/200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

定 价/22 元

书 号/ISBN 7 - 5317 - 1597 - X/I · 1512

自序

魏晋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频繁战争,残酷的政治角逐,造成了极度混乱、极度黑暗的社会现实。生命的遭受戕害、朝夕不虞的杀伐现象,比任何一个时代都要突出。佛教的传入,道家思想的流播,玄学清谈的演变,道教的发展,都刺激了魏晋人形成一种新的文化观念和思想系统。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对人类自身命运的思考和体验。

魏晋人追求美,追求浪漫的艺术化的生活,但是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了他们心底里的悲怆情绪。魏晋时代是一个悲哀的时代,他们自觉地意识到了自己生存环境、生存状态的恶劣;他们在探求人生的究竟、人生的目标、人生的意义;他们不可能不寻求生命的现实功利价值,但是他们更注重寻求生命的永恒归宿;悲哀、痛苦、恐惧、绝望、无奈是魏晋诗人们普遍的心态;潇洒、浪漫、放达是他们对自身生命境界的有机把握;体玄、优游山水、徜徉园林是他们对自己的生命境界的积极探索。岁月悠悠,时光无情逝去,正始竹林已烟消云散,只在历史典籍中留下斑驳的幻影,谢安的东山已鸢飞鸟尽,古老的山林面对现代文明的逼近在寂寞中感伤。但是,我们忘不了那个时代,忘不了那一个个在文

化史上留下烙印的鲜活身影，曹操、曹植、阮籍、嵇康、陆机、左思、王羲之、谢安、陶渊明……

本书正是从生命意识角度关注这一时代，他是在学习和借鉴学术前辈以及同时代学者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因为任何的学术研究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中生有。在二十世纪的学术成果中，首先是鲁迅先生对魏晋文学的研究，他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对魏晋诗人的生活和思想进行研究，其中很大程度上是从文人的生命意识的角度出发的。其次，王瑶先生关于魏晋文人生活的研究，沿着鲁迅研究的道路，在内容上进一步扩充和发展，对文学风尚、文学思潮、文人生活等多有研究，其中重要的就是对魏晋文人的人生观念、生命意识等的研究。在《文人与药》中，王瑶先生谈道：“我们念魏晋人的诗，感到最普遍、最深刻、能激动人心的，便是那在诗中充满了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与情感。”实际，王瑶先生已经指出了魏晋文学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倾向，那便是文人的生命意识问题。但是，鲁迅先生与王瑶先生都不是对魏晋文学中的人生问题进行专论，或者过于简单，或者一带而过。二十世纪后半叶，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都对魏晋诗人的人生意识问题给予了更多的重视。世纪之交，又有钱志熙《唐前文学的生命观与文学生命主题》、徐国荣《中古感伤文学源论》、范子烨《中古文人生活研究》等专著，正面地研究文人生活、研究文人的生命观念与生命意识。

本书的论述既关照魏晋诗人理性的人生观念，也注重评述魏晋诗人的情感表现。考察对象从古诗十九首到陶渊明，试图对魏晋诗人的人生意识进行一个总体的历史的描述。同时，为了问题的深入讨论，在注意形成一个大致的历史线索的基础上，在选题上注重选择一些典型的文学现象进行分析。因此，本书既关涉到文人生活、文人思想、文人的创作，也关涉到社会政治、

自序

历史、思想文化、美学风潮等诸多因素。注意从历史、玄学、道教、民俗等角度对魏晋诗人的生活、作品进行阐释,试图挖掘诗人的心灵世界,阐释他们对生命的思考、对人生的体验。“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本书虽然不能传之千古,但是如果能够给读者一点启发,作者的愿望也就算实现了。是为序。

2003年4月

目 录

自 序	1
第一章、古诗十九首的人生讴吟	1
第一节、古诗十九首作者的文化性格	1
第二节、古诗十九首所表现的文人群体的生存状态	10
一、功业难成的失意	11
二、漂泊无依的流浪生活	12
三、家园难归的困境	14
四、古诗十九首作者的情感状态	16
第三节、古诗十九首所表现的人生意识	18
第二章、建安诗人的人生探索与人生体验	26
第一节、建安诗人对群体生命的关怀	27
第二节、个体生命意识的增强与建安诗人对生命价值 的追求	34
一、生命本体意识	35
二、生命短暂的歌吟	37
三、政治理想抱负的追求	42
第三章、曹植独特的生命情调与生命悲剧	48
第一节、理想的悲剧	48
第二节、风流倜傥的生命境界与深隐的生命悲剧 意识	57

第四章、正始文人的人生体验与人生追求	78
第一节、正始玄风 and 人格理想模式的追求	79
第二节、人生的诗化	88
一、人是一种美	88
二、放达行为中的人格追求	91
三、放达生活的诗意把握	95
(一)、放达行为是超俗的	96
(二)、真性情、真情感的把握	98
第三节、嵇阮诗歌对生命的体验	100
一、对现实人生的悲剧性体验	101
二、阮籍诗歌的丰富情感	107
三、洁身自好、高尚其志的人格情怀	108
四、嵇阮诗歌的超迈情怀	113
第五章、功名意识的世俗化与西晋文人	
的悲感心态	121
第一节、西晋诗人的功名意识	121
第二节、西晋诗人的悲感心态	131
一、迁逝之悲	133
二、宦游之悲	138
三、死亡之悲	143
第三节、生命压抑与慷慨抒情	148
第六章、两晋文人的园林山水之趣与自	
由超迈情怀	159
第一节、两晋诗人的园林山水之游	159
第二节、自由精神的回归	166
第三节、西晋文人的山水游乐与适意之情	175
第四节、山水有清音	183

目 录

第七章、游仙——人生意识的浪漫表现	191
第一节、游仙精神探源	192
第二节、神仙世界的诗意漫游	198
第三节、神仙世界与理想人格	204
第四节、郭璞的游仙诗与幽人形象	215
第八章、清谈与东晋玄言诗	222
第一节、清谈与东晋人的心态	223
第二节、清谈的诗化	230
第三节、玄言诗——玄学生命境界的诗意表现	241
一、玄理	242
二、人生感受	246
三、“以玄对山水”	249
第九章、陶渊明的人生思考及其生命境界	252
第一节、出处的抉择和生死的思考	253
第二节、陶诗的远境	263
第三节、田园境界的创造与陶渊明的超然心境	274
主要参考文献	284
后 记	290

第一章

古诗十九首的人生讴吟

中古文学在内容上的新变,就是在文学创作中充分而强烈地表现了诗人的人生意识,这一文学思潮的真正源头就是古诗十九首。从古诗十九首开始,诗歌开始成为一种独特的精神存在,可以更为清晰地呈现士人群体的精神状态,可以更为清楚地表现士人们的人生意识。人生的种种问题,都可以借助诗歌来表达。人的生存状态,人的生存价值、生存意义,还包括人生观、生死观,人与现实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等。古诗十九首对人生的所有问题都予以思考并予以艺术地表现。应该说,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诗歌真正地进入了以讴歌人生为主题的艺术创作的时代。

第一节 古诗十九首作者的文化性格

古诗十九首中的很多问题被认作是文学史上的难解之谜。文人诗的勃然兴起,而且艺术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在诗歌艺术的发展演变这一角度做怎样的解释?更为难解之谜就是它的作者。本文从传统之说,认定其为桓灵之际下层知识分子

的作品。但是,在《文选》中不标古诗十九首的作者,故很难了解这些知识分子的身份、生活及思想情况。本文试图通过汉末历史文化背景、古诗十九首的诗歌文本,并参照史籍所载我们认定为与古诗十九首作者处于同一时代并与古诗十九首作者身份相类的有名氏诗人的情况,对古诗十九首作者的身份、思想性格、文化性格等做一推测。政治上的热切追求,是古诗十九首作者的一个重要特点。他们由乡里汇集于京师,承担着骨肉分离之苦,若是没有强烈的政治愿望是不可想象的。汉末桓灵之世是一个激荡纷纭的时代,政治上的王纲解纽,文化上的旧学瓦解,新与旧的势力进行激烈的竞争,急需创造新的社会秩序和文化秩序。在这种社会需求面前,汉末的知识分子表现出了一种积极的人世热情。参与政治,参与社会秩序、文化秩序的重建,是汉末知识分子普遍的人生价值取向,这样一种情况就形成了汉末士人的群体自觉意识。^①《后汉书·陈蕃传》云:

蕃年十五,尝闲处一室,而庭宇芜秽,父友同郡薛勤来候之,问蕃曰:“孺子何不洒扫以待宾客?”蕃曰:“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

《后汉书·党锢列传》云汝南人“范滂……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当时之士人代表李膺、陈蕃、范滂、郭林宗等,皆以天下为己任,“国而忘家,公而忘私”,极受知识群体的仰慕。《后汉书·郭泰传》:

^①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里论及关于汉魏士人的群体自觉和个体自觉比较详细,可参看。

(秦)卒于家,时年四十二。四方之士千余人皆来会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

《后汉书·党锢列传·范滂传》:

滂后事释,南归。始发京师,汝南、南阳士大夫迎之者数千两。

这种现象说明汉末知识分子有一种自觉的群体意识,意识到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并逐步形成了知识群体独特的文化性格,从而使知识群体成为了一个鲜明的社会阶层,使其严格区别于宦官群体和外戚群体两个不同的社会阶层。

古诗十九首作者们首先必然强烈感受到这种激浊扬清的社会氛围。当时士人群体之活动不仅限于京城一地,而是在整个社会弥漫开来,其影响力自然直达于社会底层。古诗作者都是些热血青年,未深涉世,对人生饱含热情并带有较强的浪漫气质。因此,离开故园,“千里涉长道”来到京城,求得政治上的发展,那是极自然的事情。他们当中不乏像李膺等人那样怀抱澄清天下之志向者,但其中的大多数,还是余英时所谓的“俗士”,亟亟于社会的政治舞台,其目的完全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求得政治上、经济上,乃至文化上地位的变化和提高。^①特别到了京师洛阳之后,在名利场上周旋了几个回合之后,他们更感到了权势地位的重要。“澄清天下”,那只不过是纸上谈兵,真正地“先据要路津”,那才是实际的目的。

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弹箏奋逸响,新声妙入

① 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

神。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申。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轲长苦辛。（《今日良宴会》）

看透了这个肮脏的社会，“士以道贵”，在他们那里，也只不过是一个遥远的童话。对李膺、范滂等人的“高言”，也不再视为人生的座右铭。令他们眼热心动的大概还是那京都洛阳的都市生活。

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驱丰策驾马，游戏宛与洛。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青青陵上柏》）

洛阳城贵戚们华贵富丽，夜生活也充满诱惑。难怪古诗作者们对世俗社会的权势、地位、财富、花天酒地的生活投来艳羡的目光。这种情形告诉我们，这些青年士子，大约都不满三十岁。他们的世界观及思想根基本来就不牢靠，正是社会急剧动荡的时期，各种生活现象纷至沓来。加之他们的理性把持力比较薄弱，对生活更趋于感性的把握。应该说，古诗十九首的作者是一群思想比较通脱的青年，他们敏于接受种种新鲜的事物，敏于接受种种新的生活方式。

后汉的学风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直接影响了古诗作者这一类青年知识分子。汉代的传统学术是通一经以致用，通经常是仕进的敲门砖。汉光武时，选举大儒桓荣为少傅。

桓荣大会诸生，勉励诸生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①到东汉巾叶，学风即有了转变。殇帝时尚敏曾上疏：“自顷以来，五经颇废，后边之士，趣于文俗，宿儒旧学，无不传业。由是俗吏繁炽，儒生寡少。其在京师，不务经学，竞于人事，争于货贿。太学之中，不闻谈论之声。遑序之下，不赌讲学之士。”^②学术新风是旧儒所看不惯的，但这确实为汉魏文化带来了新的转机。新学风孕育了新的士人风范，新的士人群体的崛起也促进了新学风的兴起，东汉士人的治学首先是由专而博。

蔡邕“少博学，……好辞章、数术、天文，妙操音律。”^③马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善鼓琴，好吹笛”^④，曾注《孝经》、《论语》、《诗经》、《易经》、《尚书》、《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等。著述之文类亦颇繁，举凡赋、颂、碑、诔、书、记、奏、表、七言、琴歌、对策、遗令等皆有著述。他见贾逵、郑众的《左氏春秋》注，评述道：“贾君精而不博，郑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⑤讲究博学多通，是汉末文人学术之追求，这与汉代宿儒判然有别。同时，汉代文人之治学，逐步冲破专门家法，而转益多师，形成了新的问学门径。何颙年少游学于洛阳，受郭泰、贾彪等人青睐。贾彪也少游于京师。

汉末文人崇尚谈论，形成了一代风气。汉末的谈论与魏晋的清谈判然有别，清谈的主要内容是名理之辨，倾向于哲学义理之剖析。而汉末文人的谈论则主要针对于具体的社会问题，是讨论政治问题的。^⑥《后汉书·党锢列传》云：

① 《后汉书》卷三十七《桓荣传》。

② 袁宏《后汉纪》卷十五，《魏晋诗歌艺术原论》56页引。

③ 《后汉书》卷九十《蔡邕传》。

④ 《后汉书》卷九十《马融传》。

⑤ 《后汉书》卷九十《马融传》。

⑥ 马季高《东汉三国时期的谈论》论之较详，可参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

逮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阹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

《后汉书》卷九十八《符融传》云：

（符融）游太学，师事少府李膺。膺夙性高简，每见融，辄绝他宾客，听其言论。融幅巾奋袖，谈辞如云。膺每捧手叹息。郭林宗始入京师，时人未识，融一见嗟服。因以介于李膺，由是知名。

孙盛《异同杂语》云：

（许劭）与从兄靖不睦，时议以此少之。初劭与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

谈论的内容涉猎十分广泛，朝廷政事、人物德才等皆为品题内容。其规模气势也十分庞大。《后汉书·谢甄传》载陈留边让“善谈论”，与谢甄“俱有盛名。每共侯林宗，未尝不连日达旦。”可见当时的谈论已达到废寝忘食的程度了。《后汉书·申屠蟠传》载：“四方名豪会帐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谈论，莫有及蟠者。”广泛地交流，相互切磋、研究、探讨社会政治、朝廷政务，哲学义理等等，有助于汉末诸子形成一种开放通脱的思想品格，古诗十九首的作者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不会不受到时代精神的影响与感召。

汉末之际中央朝廷的太学和各州郡的学校都有规模较大的

发展。刘梁于北新城“大作讲舍，延聚生徒数百人，朝夕自往勤诚”。^① 刘淑于河间“立精舍讲授，诸生常数百人”。^② 李膺于颍川，“教授常千人”。质帝时诏增太学生三万余人。从中央到地方为士子进学大开方便之门。其时太学与州郡学校人数皆可观，这也就为知识分子磋商学术、开阔视野、交流思想提供了方便条件。当时之所以产生了博学之风气，就在于文人们已破除了学术上的门户之见，博采百家。学术上的此种风气，也就造成了士风的通脱。京师太学的扩员，容纳了大量的儒生，使各地方儒生汹涌而来，也为士人们接触社会创造了条件。这也是造成通脱士风的一个重要原因。

应该说，古诗十九首的作者是与酈炎、赵壹、高彪等人的文化性格比较接近的一批知识分子。如赵壹、高彪一类人，大概就是古诗中所说的“高举振六翮”的“同门友”。高彪“家本单寒”，后与诸生“游于太学，有雅才讷于言”，“后郡举孝廉，试经第一，校书东观”。^③ 彪曾访马融，而马融不见。赵壹父祖不名，大约也为单族，曾为乡党所摈，乃作《解诂》文。^④ 这与古诗十九首中“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一句中的游子的遭际大体是一致的。古诗中之游子亦有在家乡为谗邪所害，远走他方不能归乡者。古诗之作者亦与赵壹等人一样形成了耿介之性格。他们重视自己的生命，珍视自己的尊严。如高彪拜访马融，马融托疾而不见，彪作书讥之曰：“养疴傲世，固其宜也。”^⑤ 赵壹举郡上计入京师，见司徒袁逢，“计吏数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视，壹独

① 《后汉书》卷一百一十下《文苑传·刘梁传》。

② 《后汉书》卷九十七《党锢列传·刘淑传》。

③ 《后汉书》卷一百一十下《文苑传·高彪传》。

④ 见《后汉书》卷一百一十下《文苑传·赵壹传》。

⑤ 《后汉书》卷一百一十下《文苑传·高彪传》。

长揖而已。”^①赵壹于弘农拜访太首皇甫规，门吏不与通报，“壹遂遁去”，皇甫规作书以致歉意，赵壹“遂去不顾”。性格的狷介是这些青年士子的共同特点。既要拜谒于朱门高士，又要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在这乱世当中，他们逐渐形成了尊重个性的独立的人格追求。《明月皎夜光》诗中说：“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诗里洋溢着遭受零落之后的悲哀，其实也包含着对自我人格的尊重。

汉末中下层士人在这种时代风潮的影响下，也自觉地参与到时代风潮之中来。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从他们“几乎一字千金”的传世作品来看，他们都是一些极富文学才华，极具文学创造力的青年。他们不是谨身守礼的宿儒，而是都具有充沛的诗性精神。他们的感情极为丰富，对于新体五言诗具有纯熟的艺术把握能力。通脱的性格特征，对自己个体意志的尊重，使他们极乐于追求情感的体验，注重情感的表达和抒发。京都洛阳的文人之会，处处都有他们的身影，这是一群思想极为活跃的知识分子。《今日良宴会》云：“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弹箏奋逸响，新声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伸。……”这自然是一次宴会，从场面的热烈可知，参加的人定然不少。但从“令德唱高言”句可以推测，这又是一次带有“谈论”性质的文人聚会。文人聚会、饮宴，人物与社会政治的谈论品评合而为一，这是汉末文人聚会的大音乐中的一段插曲，足见古诗十九首的文人们已预于汉末文人聚会之群体之中了。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亦极具音乐的鉴赏能力。汉末文人皆好音律，《后汉书》中记载颇多。古诗十九首中多有写音乐鉴赏的诗句。前引《今日良宴会》诗写“弹箏奋逸响，新声妙入神”，是赏音声者已进入了音乐的境界。“新声”非传统雅乐，而是从

^① 《后汉书》卷一百一十下《文苑传·赵壹传》。